

由于长期掩护我游击队抗日武装组织，两兄弟一直受到日伪、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缉和追捕，很长时间都不能公开露面。日伪、反动派每次在搜捕游击队员的时候，谭家必定首当其冲。但即使被日伪、反动派盘问，谭家的每一个人都始终守口如瓶，不曾泄露过游击队员的半点消息。

1949年3月，游击队接到国民党围剿五桂山的错误情报，便迅速分为三队躲藏。其中一支队伍在凌晨2点30分赶到了谭家昌发围馆。由于人马众多，只能在禾草堆上休息。三天以后，警报解除，他们才得以撤退回五桂山区。队伍撤离后，谭家立即清理现场，避免被人发现游击队来过。

1949年10月30日上午，中山独立团和五桂山革命根据地人民一千多人，从大鳌溪出发挺进石岐，与两广纵队先头部队胜利会师，石岐宣布解放。谭吉兆事先做了大量解放宣传工作，就在解放当天，他也参加了解放军在仁山广场举行的进城仪式和大游行活动，和谭桂明、黄乐天、李志海等革命老同志一起合影留念。

（供稿 徐一川）

中山县长张惠长 一生倥偬波澜壮

张惠长（1899 ~ 1980 年），字锦威，中山市张家边大环村人。是早期中国空军最出色的飞行员，曾在孙中山麾下任航空局副局长，此后任西南空军总司令，中年回到家乡中山出任县长，率领中山军民与日本侵略者殊死搏斗，直到率部光复中山。其一生的轨迹，大致由两个阶段构成。

无畏的飞将军

张惠长幼年随父到美国。民国成立后，为壮大革命力量，孙中山正式提出“航空救国”的主张。此举得到中国国民党美洲总支部林森的支持和响应。在华侨的资助下，中国国民党空军学校终于在美国创办。张惠长于 1915 年到设于寇蒂斯的航空学校学习飞行技术，是该校首批 20 名学员之一。1917 年他毕业回国，任孙中山大元帅府侍从武官，翌年任大元帅府参军副官。

1922 年，孙中山创立航空局，任命杨仙逸担任局长，下设两个飞行队，张惠长是第一队的队长。期间，杨仙逸、张惠长等曾与美籍工程师合作，在广州大沙头创办广东飞机制造厂，成功制造出一架飞机。孙中山欣喜之余，特将此机命名为“洛士文号”（宋庆龄的英文名字为 Rosamond），还与宋庆龄一起在飞机前摄影留念，并在机场亲书“志在冲天”的横幅赠送给杨仙逸，以示表彰。

杨仙逸和张惠长奉命驾机参与讨伐军阀沈鸿英，迫使沈鸿英部队溃退广西。随后，张惠长参与广州大沙头机场和白云机场的建设。他曾奉命赴闽，组建援闽粤军飞机队。1922 年任航空局副局长、北伐军飞机队队长。1927 年任广东航空学校校长、航空处处长。

1928年，张惠长曾驾“广州”号飞机单机环飞全国，一时间在全国掀起航空热。

环飞全国壮举的起因是：1928年，原广东航空局改组为航空处，由林伟成任处长，不久由张惠长继任，陈庆云任副处长（三人均在美国学习航空后回国）。为了宣传“航空救国”的思想和提高民众对发展航空事业的兴趣，航空处用中华航空协会第二特区（广东区）的名义向美国瑞安飞机公司购入当时较有名的瑞安B-5型“四轮马车”（Brougham）5座单翼飞机水陆型各一架。陆上型飞机被命名为“广州”号，水上型被命名为“珠江”号。在熟练操作后，决定筹措长途飞行创举。飞行日期确定后，即将飞行所经降落地点、路线发电通知各地，请予合作。

首航机“广州”号由张惠长任机长，与第二队队长杨官宇（中山南区人）、航校教育长黄毓沛、随机机械师杨标等人组成机组。1928年11月11日8点15分，“广州”号从广州大沙头机场起飞，中途曾遇恶劣天气，14点30分降落武昌南湖机场。11月15日9点50分，“广州”号飞往南京，13点30分降落南京明故宫机场，受到冯玉祥将军和南京政府军政界及各界代表数百人的热烈欢迎。17日14点，南京各学校、社团及军队约五万人集会，会前由“广州号”凌空散发红白色宣传“航空救国”的传单。会上胡汉民先致辞，接着戴传贤发表演说，随后由张惠长报告飞行经过及飞行计划。会场悬挂的宣传标语有“飞行是促进国利民福的第一武装”“总理说：飞上天都做得得到，何事不成？”“此为中国空军建设努力的表现”“举国一致迎头赶上世界最新之文化”等。会场中央停放着“广州号”供群众参观。

11月19日，“广州号”离开南京飞往北平。当接近北平时遇大雾，傍晚时分迫降于河北廊坊。次日9点30分，“广州”号由廊坊飞往北平。11月26日下午降落奉天（今沈阳）。当时，奉系统治东北，仍沿用北洋时代的旧国旗五色旗，而“广州号”的机翼、垂尾均有国民党的航空标志，东北当局能否接受，尚无把握，没料到竟受到张学良为首的东北航空界人士及当地政府官员的热烈欢迎。事隔不久，东北宣布易帜。12月1日15点21分到达天津。12月4日飞抵上海。于12月8日与另一架长途飞行的“珠江号”会合。12月17日9点，“广州号”携带纪念长途飞行邮件回航广州，途中因天气不佳，便在南昌降落停留一宿。18日14点安全降落起飞地点大沙头机场。飞行全程为5890公里。

南京政府航空署致电广州航空处祝贺，电文如下：

广州航空处张处长及杨黄两同志钧鉴巧电敬悉诸同志此次作全国长途飞行实开我国航空界之新纪元天马行空长风万里厥功告竣举国腾欢特电复贺祝鸿勋熊斌张静愚叩个印

“广州”号和由陈庆云任机长的“珠江号”的先后两次飞行，飞越了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山东、河北、辽宁、浙江、福建多个省份的上空，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在天空飞翔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的梦想，但真正能够上天飞行的飞机，直到1903年才由美国的莱特兄弟制造并试飞成功。至于跨越大洋的长途飞行，更是直到1927年5月，才由美国的飞行家林白予以实现。但仅仅在一年后，张惠长、陈庆云等中国飞行员便已实现可与之相比的长途飞行，可见当时的中国在新崛起的航空事业上并不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

当年的飞机制造尚处于起步阶段，所生产的飞机结构简单、性能低劣、稳定性很差。再加上机上没有无线电通信系统，对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只能在飞行前靠前站提供预测，如在飞行过程中遇到突发的恶劣天气只能迫降，因而长途飞行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就在进行单机环飞的前一年，张惠长与他的战友，还曾经发生过一起严重的飞行事故。为了庆祝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在北伐战争中所向披靡，大败吴佩孚部队，攻下武昌，并与第三军合作在江西击破孙传芳主力，攻下九江及南昌，从而奠定北伐成功的基础。1927年第四军凯旋时，广州军民举办了规模空前的祝捷大会，时任广州航空学校校长的张惠长义不容辞地担起在空中散发传单的任务。他与另一位飞行员聂光汉各带一名助手，分别驾驶一架亚扶路型飞机升空执行这一任务。不料其中一架飞机在升空不久即因机械故障下坠，另一架飞机也因承载传单过重下坠，聂光汉当即殒命，张惠长等三人也负了重伤。神奇的是，此后，张惠长竟很快地恢复健康，而且再接再厉，终于在一年后圆满地完成了单机环飞全国的壮举。

“单机环飞全国”之举震动了中外航空界，同时也让国人预见了在中国开辟民航航线的可行性，不久，交通部和广州即已开始办理开通民航航线。张惠

长等人实际上是中国民航事业的先行者。

1929年，张惠长升任南京航空署署长、中央航空学校校长，在任航校校长期间，他共训练了学员199人。

张惠长于1931年被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委，并随孙科到广州，任西南空军总司令。期间曾发出号召空军人员誓不参加内战的通电，得到广东省全体空军的签名响应。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奋勇抗敌，迅速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潮。但事后，十九路军却被蒋介石强行调去福建攻打红军。蒋光鼐、蔡廷锴二人不想打内战，于1933年11月21日在福建与李济深联合，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红军订立了“反蒋抗日”的协定。张惠长对十九路军的抗日主张十分支持。1933年底，他发动空军第一、五中队长邓粤铭、刘植炎，航校校长杨官宇等人，取道香港前往福建，计划协助李济深组织抗日空军。但福建人民政府很快在蒋介石的围攻下解散，故此行未果，张惠长只好快快折回广州。

早在1932年淞沪会战序幕揭开之初，张惠长就曾组织一支混合机队前往杭州，支持十九路军抗日，因而被日寇视为眼中钉，扬言“广东飞机队飞到哪里打到哪里”。广东飞机队在劣势下浴血苦战，战功显赫，但损失也很惨重，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损耗根本无法补充。由于广东空军在陈济棠治粤时期曾经追随西南联合政府反蒋，因而蒋介石对广东空军素存成见，在电令广东空军撤至安徽后，不久便把它的番号撤销了。1935年张惠长调离空军，赴外出任驻古巴公使。

守土的真勇士

1937年10月，张惠长受孙科委派，回到家乡出任中山县长。赴任后的首要大事，就是建立一支具战斗力、可以随时击退日军进犯的守土部队。

其时，日军发动的卢沟桥事变已经发生。翌年2月，日军攻占中山三灶岛，并在该岛的莲塘湾修建机场，每天从三灶岛出动战斗机，轰炸广州、佛山、中山石岐等地。

按照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精神，张惠长努力加强战时体制，先后成立了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三区统率委员办事处（张惠

长任统率委员）、中山县地方守备总队（张惠长任总队长）、中山县各界联合抗战后援委员会（国民党中山县党部书记长林卓夫为负责人）等机构，并将原来只有三个政警中队、两个壮丁中队的武装，扩充为三个政警中队、十个守备中队、九个区一级的民众抗日自卫大队（集结大队，也称别动大队）和一个商会的义勇壮丁大队，人数共达 2000 人。张还将公安科改为公安局，侦缉队扩至 50 人，配备手枪，成为一支精锐的武装力量。1938 年 2 月，他被任命为第三游击区司令部司令。

1938 年 10 月 12 日，日军集中陆、空军兵力七万多人，在大亚湾强行登陆。为避其锋芒，广东省政府、国民党部及第四战区的大部分部队均从 13 日起撤往粤北。10 月 21 日，广州沦陷，其后，顺德、南海、三水等地相继失守，中山实际上已经成为敌后的孤岛。

中山县长兼第三游击区司令张惠长并不气馁，他从同仇敌忾的中山民众身上看到了希望。他慨然发出号召：“有一尺之土，当据而力战！”他解释说：“顾因广州之陷，已日在风声鹤唳之中。敌之宣传，早晚必到谋我。且县境四面防守，兵有未敷，势有不得不恃死斗之一法，以保邑中土地而已。”

为此，他抛弃党派成见，欣然接受中共中山县委建议，两党联合成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县队部。半年内，中山抗日先锋队发展到拥有三千多名成员，成为广东省抗日先锋队属下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青年抗日群众组织；随后成立的中山县战时妇女协会也拥有一千多名成员。张惠长和夫人薛锦回，分别担任这两个组织的总队长和会长；中共党员孙康、刘紫云分别担任副总队长和副会长。

而在此之前，张惠长已于 1939 年 3 月被余汉谋免去游击区司令之职，改派吴飞为司令，但他仍是县长兼地方守备总队长，再兼县民众抗日自卫团正统率委员，还管辖一支公安部属下的政警大队。所以，保卫乡土的决心仍然很足。某次，轰炸石岐的敌机掠过民房低飞，他一怒之下，竟走出了县府（学宫）的防空洞，亲自手提机枪向敌机猛烈扫射，打得敌机慌忙升空逃窜，目睹者无不为之折服。

强敌压境之际，富有作战经验的张惠长料定：日寇进犯中山，必从叠石、横门两地突袭。为加强防御，他决定在横门沿岸构筑两道防线，并在横门水道南岸沿线重点布设水雷。

1939年7月初的早稻收割季节，为了从中山人口中夺粮，日军终于忍不住向中山动手。他们的计划是，从新会睦洲出发，兵分三路进犯中山。其中，叠石、全禄为主攻目标。我方则早已得到情报，从7月8日起就在青岗集结待命。

7月9日上午8点，两翼之敌在特沙和横涌受到阻击。9点，主攻之敌在飞机和浅水舰的火力支援下进犯叠石、全禄。两村村民先是坚壁清野，继而安全后撤。在激烈的交火中，部分阵地一度失守，但到10日凌晨4点，叠石、全禄均已收复。

日军不甘失败。10日上午，又以浅水舰五艘、汽船和橡皮20艘，从横门水道进入石岐西河，驶向福荫围和黄牛头山两岸，又从三灶派出四架水上飞机进行空中支援，企图强行突破，直扑石岐。敌军登陆抢滩时，我军布下的水雷大显威力，炸毁敌军一艘铁壳拖船、五艘橡皮艇。相持数小时后，日军伤亡惨重，被迫在飞机掩护下撤回海上。

1939年7月24日上午8时，日军集结大小军舰各一艘、浅水舰四艘、武装渔船六艘、胶艇13艘、汽艇14艘、运输船两艘，以绝对优势兵力向横门推进。三灶岛机场也同时出动飞机两架，反复轰炸仰天山、大尖峰、芙蓉山、笔架山，其后续飞黎村、东利涌、灰炉涌、下岐涌。

经过24、25日的试探性进攻后，26日下午3点30分，日军在军舰和飞机的火力掩护下，以二十多艘橡皮艇载着两百多名士兵，分三路在横门登陆并向纵深推进，先后抢占了玻璃围、猪山、芙蓉山、大岗山、仰天山和大尖峰等制高点。

张惠长途中闻讯，立即驰赴前线。当接近前线时，其行踪被敌军发现。敌炮手连发两炮，炸伤了一位卫士的手臂，张惠长镇定如常，抵达黎村后立即就地重新组织火力，指挥机枪数挺冲上珊瑚洲村后山，把敌人的火力压了下去。

27日，转入相持阶段。中山抗先第四区队的武装集结队开往黎村一带，协同国民党守备队抗击大岗山方向的日军。

28日，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反攻。入夜，大岗山之敌向大尖峰之敌求援，而芙蓉山之敌却以火炮攻之，双方误战三个小时，伤亡颇重，我军乘机冲进，收复了芙蓉山。

30日，我军从芙蓉山出发，冒雨突袭仰天螺。大约在同一时刻，企图从小隐河口突破的敌舰、运输船各一艘触雷沉没。

31日下午4点,日军在舰艇、飞机的火力掩护下开始撤退,我军则全线出击,扩大战果。至此,历时八天的横门保卫战首战告捷。是役日伪军伤亡两百多人,我军伤亡不足100人。

战后,中山“抗先”第四区队长孙海筹(国民党爱国人士)对香港《星岛日报》记者说:

“我军能迅速取胜,是与民众的支援分不开的。敌军撤退后,灾民已全部回乡并得到安置。他们多属水上居民,政府也有拨款救济。有不少人还不愿接受赈款,宁愿让给困难多的灾民。”

9月7日,日伪军调动2500人,登陆艇三十多艘,飞机十多架,再次向横门进犯。

8日,敌军三百多人在芙蓉山、玻璃围一带强行登陆,苦战至入夜,双方伤亡惨重。

9日,敌军攻占大尖峰。

10日,东线我军转入纵深防御。

11、12日,双方激烈争夺大王头,阵地数度易手。

经过侦察得知,此时日军正采取迂回战术,企图从东西两翼包围我军。因此,前线指挥部决定,东线横门守军撤回二线;西线则在张家边一线布防。至此,企图从两翼包抄我军之敌,反陷入我军天罗地网之中。

13日至20日,双方在三仙娘山、猫儿头山、大环河进行了三场恶战。三仙娘山之战,一天之内击毙敌军两百多人,我方仅伤亡30人。而在我军对猫儿头山的一次夜袭中,敌军留下的数十具尸骸竟全是伪军,原来日军早在入夜前已躲回军舰。大环河之战,敌军因两次冲锋均遭惨败,竟迁怒于老百姓,一把火把大环、渡头的民房、店铺全部烧光,躲避不及的老弱妇孺则被刺刀捅死。是夕,张惠长在西樵山上望着家乡的冲天大火,悲愤地对大环抗日先锋队大队长李渐逵说:必须抗战到底,民众才能免除祸殃。

到9月20日,我军已收复大部分失地,并追敌至距大王头山仅60米处,又一次形成僵持之局。日军竟将抓获的十多名士兵和农民绑在阵地前沿的木桩上,或将其下半身埋于土中,以作人肉屏障。

9月21日,持续14天的第二次横门保卫战告一段落。此役被击毙日伪军多达600人,飞机一架;我方参战兵力共1600人,牺牲四百多人。

9月21日，敌军主力撤回海面舰艇上，只留少量兵力固守大王头。敌方守而不退，我方则围而不攻。这一胶着状态一直持续到10月6日上午。

9月27日恰逢中秋佳节，正是敌我双方在大王头对峙的相持阶段。张家边妇女纷纷把传统糕点月饼送到前沿阵地。澳门同胞也以月饼慰问前线官兵，竟致阵地上的月饼堆积如山。

据不完全统计，在叠石之战、黄牛头山之战和前后两次横门大战中，中山军民同心协力，把号称“钢军”的日本侵华第五师团打得落花流水，共歼敌千人、战机一架、舰艇八艘。这是日军进入华南战场以来损失最惨重的战役。

横门初捷，本该庆贺，但此时，国民党第五届五中全会制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已在全国推行。如果说，1939年3月，坚持团结抗日的张惠长被免除游击区司令之职，仅仅是个不祥的征兆。那么，到1939年秋，局势已经相当明朗，先是林卓夫取代张惠长，接任国民党中山县党部书记长；同年12月15日，在韶关召开的广东省政府第九届委员会上，“主席（李汉魂）提议，中山县长张惠长撤职交本府吴飞委员察看，并着随同服务戴罪自赎，遗缺派吴飞兼理”获议决。张惠长被革职，意味着局势已经急转直下了。

对此，当时的中山人评论说：“走了会飞的县长，来了唔（粤语，谐音“吴”）飞的县长。”

1939年8月，国民党县党部宣布解散“抗先”“妇协”。9月，通缉中山“抗先”第一区队长张鹏光（县立一小校长，中共石岐小学党支部书记）和中山“抗先”副队长孙康。就在军警开始围捕行动前三个小时，张惠长暗中派人通知孙康。孙康及时离开西桠村，转移到沙边、长命水，9月下旬安全抵达香港。

而经横门失利后，为了“重振军威”，日军决定以旅团长川田为指挥官，从新会、江门抽调1500人，从南海九江抽调1000人、马队300人，加上三灶岛的受训新兵800人进攻中山西线；又从宝安抽调1500人，进攻中山东线。还出动飞机四十多架，战舰十余艘，汽艇、胶艇四百多艘，连同已进入横门的部队共六千多人，兵分五路，合围中山。

1939年10月6日下午7点，西线日军在叠石、全禄、石井登陆后，连陷南村、安堂、南文、濠涌、下坊、青岗、沙溪，我方第二区自卫大队长林勤邦在指挥战斗中阵亡。日军的另一路人马渡河攻占一区金鱼环，再经渡头、沙涌直扑石岐。敌汽艇由横河窜犯一区树涌、曹边，会合三灶岛新兵夹攻北台。在曹边，他们

遇到了乡民的关闸抵抗，久战不下，被迫绕路经沙涌扑向石岐。

进攻横门的日军于7日早晨突破了小隐、大环；在张家边，则遭遇到节节抵抗。

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7日下午2点，张惠长决定率石岐守军全面撤出，向五桂山转移。

日军先派出少量伪军入城试探，证实没有守军后，日军乃分西、南两路进入石岐，把司令部设在南门方基巷内。

日军虽占领石岐，却始终对中山军民有所忌惮，不但不敢如占领别处那样给士兵放假，还匆匆以主力布防于石岐外围。次日，进入岐江河日军舰艇共计一百多艘，意在耀武扬威，为不久前在中山创下的败绩涂脂抹粉。

敌军进入石岐后，接连三次到侨立医院搜索伤兵，但一个也没有搜索到。失望之余，领队的少佐拔出指挥剑，意欲对病人、产妇大开杀戒，经医院内的外国传教士哀求才勉强罢手，但仍把医院内的药品和器材全部带走。

8日下午，张惠长在石莹桥召开军事会议。他指出，必须趁敌立足未稳之际快速反攻，先绝其与外围的联系，然后分进合击之。

谁也没有想到，仅在三天后，入侵石岐的日军就匆匆撤走。

别动队司令袁带闻讯，急率数百人与第一游击区司令部参谋长萧祖强部在横栏会合，迎头截击敌人。双方相持多时，敌军才在炮舰的火力掩护下离去。

10日上午，我军复入石岐，中山县的第一次失陷（俗称“石岐三日沦陷”）至此结束。

1940年1月16日，日军在粤北会战受挫。2月，改组后的驻华南日军，又把目标指向了顺德和中山。

3月1日，日军第38师进犯顺德县城大良；4日，日军获悉吴飞竟偕林卓夫赴南屏向联合中学学生训话，当晚就在澳门盘桓，决定趁此机会，立即进犯中山。

从3月5日直到15日，日军18个师团共动用一万兵力入侵中山。

5日，日军从顺德攻入大小黄圃。

6日，从海路登陆唐家、香洲，陷前山、坦洲、翠亨。

7日，陷南朗、张家边、三乡、恒美、石岐、沙溪、大涌。

15日，陷小榄。至此，除三、九区外，县境大部分沦陷。日军到处抢掠财

物、奸淫妇女、屠杀平民。

由于缺乏统一指挥，致使日军长驱直入，只遭到各自为战的部分地方武装的零星抵抗。

7日下午，日军第18师团进占石岐，据学宫为司令部，又把原警察局改为伪绥靖救国军司令部。不久，日军扶植下的伪军参谋长欧大庆经小榄到了石岐，建立起各级伪维持会和伪政府。自此中山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下，历时五年之久，直至日本投降才得以光复。

吴飞此时已无法返回县城了。6日下午4点，他辗转经坦洲回到三乡平岚，7日晚再转赴斗门。此后，吴飞将游击队司令部及县政府迁到八区。同年5月，吴飞解职，袁带继任游击队司令，书记长林卓夫兼任县长。1941年年初，林卓夫卸任，萧豪继任县长。同年2月8日，日军入侵八区，县政府迁新会，游击队司令部迁往鹤山。同年10月，“挺三”司令袁带兼任县长，县政府一并迁往鹤山。

石岐沦陷，并不表示中山守军已经丧失战斗力，经重新召集、整编，吴飞、袁带等人将游击队司令部及县政府先设在八区，再迁入新会、鹤山。1940年5月改编为挺进第三纵队，所辖部队控制着鹤山、顺德、中山部分区域，守住一片国土。到后来，坚决抗日的张惠长也从澳门赶来了。1943年8月，曾一度迁到澳门复课的中山县联合中学也迁到以鹤山作屏障的恩平。资料表明，到1944年为止，日军对鹤山共进行了53次扫荡，18次炮轰，158架次空袭，造成505人死亡，389人受伤，比起周边沦陷区，损失还是较小的。

与此同时，中山县公安局侦缉队长梁新年率领的五十多名侦缉队员，在退入三、九区后，与九区抗日集结大队会合，新组了一支“抗日歼伪、保卫家乡”的游击队伍。为避敌耳目，挂的是“民利公司”招牌，以二、三、四、九区为潜伏行动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

艰苦的八年抗战终于结束了，1945年8月12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正式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

1945年7月1日，经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立法院院长孙科、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等电促，闲居古镇海洲的张惠长接替方岳昭重任中山县长，在县境内距小榄十多公里的三区怡围设立战时县政府。

8月15日，县长张惠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刘次修、“挺三”司令伍蕃

等人率部推进至二区溪角乡办公，就近监视县城日军。张惠长派警察局局长萧仇率武装队伍先进入县城维持秩序。日军司令鍼谷亦派遣高级官佐二员，至溪角叩访张惠长，表示唯命是听。

10月7日，石岐县城光复。159师师长刘绍武、县长张惠长率文武官员举行入城仪式，并在仁山召开县城光复群众大会。同日，县政府从鹤山沙坪迁返石岐，进驻学宫。

中山民众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欢庆中山光复。万人空巷观看受降仪式，纷纷把唾沫吐向被押赴码头的日军。

为了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据1945年12月中山县政府的统计，在沦陷期间，仅饥饿致死一项，县民的死亡数高达12.4万人。

战后的中山满目疮痍，作为光复后的第一任县长，张惠长如何着手？

首先，重整国有金融机构。1945年底，广东省银行中山支行重建（降格为办事处），行址设于石岐孙文西路222号；1946年，中国农民银行中山办事处在石岐成立，地址设在石岐太平路405号，主要业务是农业贷款，兼办商业、机关、团体、个人的存、贷款。为执行国民政府“恢复农村经济，改良农业生产”的政策，该行与中美联合总署、广东省粮食增产处合作，办理了大批化肥及良种贷款业务。贷款的主要对象是国民政府组织的乡、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县、乡政府担保还款，其次是乡农会由县政府担保还款。

其次，成立民意机构。1946年2月11日，中山县临时参议会成立，魏颀明任议长。会址设在石岐高家基林氏宗祠。

更重要的当然是恢复生产。沦陷期间，日寇“以战养战”，大肆掠夺，迪光电厂的发电机组也被搬走。张惠长动员李德联出资重建石岐电厂，恢复县城供电。1946年10月，李德联投资的思豪酒店开张，带动了中山建筑业的复苏。由于广东海关撤销出口税，各行商人纷纷搜集蚕丝、桐油、茶叶、桂皮、鸡鸭毛、纸张、竹器等运往美国、英国。经报验出口的商品，当年大幅度增加1/5。随着货畅其流和侨汇的恢复，居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

同年11月，县政府决定按田亩每亩征谷十市斤，作为本县的军人复员和建设经费。而在此前的同年5月，县政府还责令商会以“按铺面阔度比例负担该段筑路经费”的办法新辟南基路。

县政府在开源的同时实行节支，缩减基层机构，撤销第一、二、四、五、六、

七区，全县乡镇由 364 个缩编为 67 个。

县政府呼吁海外华侨捐资，把石岐烟墩山开辟为中山公园；在迎阳公园建造“中山县抗战殉难先烈之墓”。同年 8 月，香港永安公司捐资于家乡竹秀园兴建景春水闸。

教育方面，则制订了《推行国语运动实施计划书》，组织机关学校职员参加培训班学习；规定公务活动一律使用国语；又采取多种形式推行国语，规定师范生注音符号考试不合格者不得毕业。

张惠长的贤内助薛锦回也没有闲着，她随同张惠长返回中山时，从鹤山带回了将近 200 名孤儿。

薛锦回（1905 ~ 1985 年），祖籍中山三乡，父亲曾在上海经商，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家政系，1928 年在上海与张惠长结婚。抗日战争期间，薛锦回曾担任中山县妇女协会会长，与中共刘紫云合作，举办过两期妇女骨干培训班，讲授“妇女运动历史”“国共合作宣言”“救护常识”“军事知识”“论新阶段”及教唱抗日歌曲等。在横门保卫战中，曾组织妇女到前线救护伤员、送茶送饭。

1940 年 1 月，张惠长被革除职务后，薛锦回随夫来到了澳门，其后独自回上海。1942 年初，张惠长先撤到中山黄圃，再转赴鹤山县时，薛锦回冒险由上海出发，途经已沦陷的香港转赴鹤山，与丈夫共患难。

1943 年，她在鹤山开办“中山儿童教养院”，亲自上街宣传，筹集善款、粮食、衣服、棉被等，接济因战乱而失去双亲的难童。

抗战胜利后，她任中山县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救济院。救济院原名“中山难民收容所”，院址初设在石岐莲塘街郑氏三公祠。该院把难童按年龄和文化程度分为六个班，分别按小学不同程度的课程施教。早上 5 点起床，8 点上课。课堂是流动的，有时在操场，有时在宿舍，有时在天井。下午组织难童生产自救，工种有编织、垦殖、饲养等。1946 年初，薛锦回认为不宜把难童和成年难民混在一起，征得各界支持，专为难童办起了“中山县育幼院”。

在此期间，她还积极为因抗战而失学的儿童办学校，如 1946 年 8 月在寿山里开办的“中山小学”。又打算筹建四区中学，已选好南朗大车村山麓为校址，并从张家田产中拨出 100 亩作为启动经费。

她对民众教育也很重视，曾借用县中的课室举办妇女识字班。针对当时中山盛行的买卖婚姻、包办婚姻，她效仿抗战前民众教育馆的做法，提倡集体结婚，

提倡结婚自由，保障妇女权益。

在以张惠长为首的县政府的治理下，光复仅一年，中山已重现生机。

1945年国共双方签订的《双十协定》，本该为国人带来持久和平，不幸的是，协定并未得到切实执行，1946年6月，国共两党内战全面爆发。同年10月，张惠长因“剿共”不力被免职。

卸任县长后，张惠长虽然还挂着立法院委员、国大代表等虚衔，政治生涯实已结束。1949年，他偕同夫人薛锦回经澳门前往台湾。资料表明，由于张惠长一贯的反蒋立场，蒋介石在他的档案里批上“永远不能起用”几个字，只让他偶尔参与中华航空公司事务。1980年7月17日，张惠长心脏病突发，在台北逝世。

（供稿 刘居上）

追忆横门保卫战 抗战胜利叹多艰

1937年7月，卢沟桥的枪声震醒了中国人民。时隔年半，日寇的铁蹄便已逼近中山，一场全民抗日救亡的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此际，中共中山县委顺应抗战形势，致力于国民党县政府当局团结合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县总队（简称“抗先”）、中山县战时妇女协会（简称“妇协”）于1938年12月至1939年1月先后成立了。转眼间，三千多名“抗先”队员、“妇协”会员活跃在中山城乡，开展抗日宣传，为抗击日军入侵做准备。抗日先锋队的成立，为以后建立抗日武装打下重要基础。

1939年春天，在这一重要时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关于“巩固和扩大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传到中山。中共中山县委为进一步做好统战工作，由县委书记孙康以“抗先”副总队长、县立第七小学校长、群众代表及同乡的身份，积极与国民党中山县县长张惠长接触，共商联合抗日保家卫国大计。我方在商议中指出，中山七区（三灶）已落入敌手，数千居民被屠杀；广州已沦陷，日军入侵中山势在必行，必须全力做好抗战准备。与此同时，还转达全县广大群众对抗战的迫切要求，以及宣传我党关于“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和“全面抗战”的主张，要求他下定抗日的决心，依靠全县人民群众的力量一同抗日。

张惠长是中山县四区大环乡人，原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和航空署长，是一名老政客。他是孙科派的人物，同蒋介石那一派扶植的当时的国民党县党部长林卓夫有着较深的矛盾。为了维护他在中山的统治势力，在“抗日救国”的问题上，经过会谈和晓以民族大义，又面对日军逼近、中山群众的高昂抗日情